

“调结构”与“保增长”并不矛盾

沈凌

问题是“短期政策长期化”

中国经济增长正在经历着一场严峻考验。

一方面,随着世界经济步入低谷,我们的出口下滑,投资减少。这是经济周期的短期效应。过去几百年,市场经济国家无一不经历着这样的周期性波动。曾几何时,我们试图去理解这种波动的源泉,更进而试图去消灭这样的波动。但其结果是从理论到政策的失败。现在,经济理论界转而认同这样的波动,并开始着重于对冲击反应的研究。另一方面,中国经历了二十几年的高速增长,我们的劳动力成本理所当然地提高,很多原先布局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出现了移出中国的趋势。比如最近媒体报道的阿迪达斯关闭了中国大陆境内的唯一一家全资工厂;还有媒体报道的墨西哥正在取代中国成为很多以北美市场为主的厂商的制造基地。这是经济长期增长的结果,和经济周期并不直接相关。但是现在两个问题交织在一起,给我们的政策运用出了一个难题。

“保增长”针对的是前一个经济周期问题。当一个经济体受到外来冲击,产出出现严重下降,失业工人急剧增加的时候,政府出台“保增长”的财政刺激政策或者宽松的货币政策,都是无可厚非的。2008年的4万亿刺激政策挽救了多少农民工的就业生计问题,支持了多少中产阶级免于美国式

的破产境地!现在危机过去,副作用显现。如果我们简单地指责,甚至认为当时根本就不应该出台这样的刺激政策,那就有点“过河拆桥”式的不厚道了。但是检讨政策得失,为以后的调整政策积累经验,那并不为过。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我们的周期性刺激政策最大的问题是“短期政策长期化”。比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在经济低谷出现的时候,民间投资萎缩,失业率高涨,的确是政府运用财政政策投资建设基础设施的好时机。因为即使仅从投资成本计,这时候也比经济高涨时期低很多。但是一旦投入,拉动了经济走出了困境,就要面对“国进民退”的窘境。这时就需要有一个预设的退出机制,把这部分危机时期形成的资产出售给民间资本,以提高运营效率和积累国有资本为下一场的危机做准备。如果没有这样一个退出机制,每一次危机的财政刺激都会导致“国进民退”,那么我们的市场化改革方向就会慢慢逆转。国有资本运行效率低下,会逐步侵蚀掉低投入的优势,最后总是拖累经济偏离最有效率的资源配置状态。

在成熟的市场经济我们都能看到这样的短期刺激政策和退出机制。比如香港政府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干预市场,市场恢复之后,就出售了购入的资产;现在的美国政府也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期间买入了很多的金融机构股份,现在也在逐步退出。所以,在这些经济体不会出现由于短期政策干预形成国有化的长期趋势。

对于第二个问题,大家都似乎找

到了一个对策,那就是“调结构”。但凡是谈到中国经济增长困境的,无不用需要“调结构”一词来表达自己立场观点的正确性。但是,这个口号喊了十来年,一直不见得有什么大的功效,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专家太自以为是了。一方面秉承市场经济理念,要求政府放手少干预,另一方面又在指手画脚代替资本规划未来。逻辑上不矛盾吗?要我看,之所以我们不太看得过去十几年来年的调结构功效,那就是因为我们的经济发展阶段还没有到非要“调结构”的时候。有人说我们不能再依赖“重投资轻消费”的方式来拉动经济增长了,那是搞混了长期增长和短期波动这两个不同的经济问题。

当前还需要投资拉动

从长期来讲,经济的增长不依赖投资还能依赖消费吗?那真的是一个可以得到诺贝尔经济学大奖的发现!其实对比中美当今两大经济体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我们就可以发现中国的投资不是太多了,还是远远不够!正是由于过去几十年的高投资,我们现在在高速公路里程上基本接近了美国的总体水平,但是在铁路、机场、输油管道等等各个方面,都还有不小的差距。特别是大学数量,远远落后,更不要提大学的质量。

所以,从长期的增长潜力来讲,我们现在还是需要投资拉动。没有大量的投资,我们怎么能在未来形成相应的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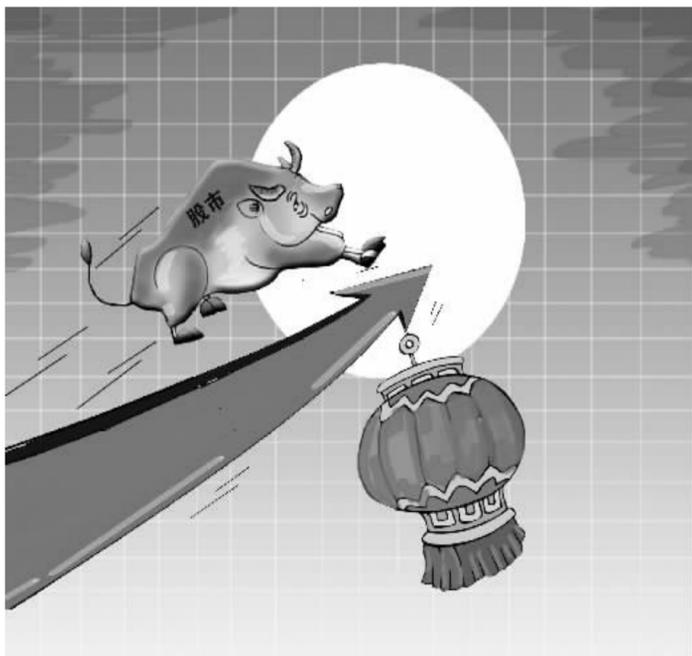
出能力?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需要调整的不是投资量,而是投资决策的主体。我们应该继续市场化改革的总体方向,让民间资本逐步进入各种投资领域。当然,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建立健全对投资人权益的保障机制。如果没有权益保障机制,就说欢迎投资,是引不来民间资本的。

现在很多人讲,“西部保增长,东部调结构”。其实,保增长也好,调结构也罢,东部西部都需要,这不是一个地理上的区别,而是一个长期短期的分别。西部固然需要大量投资拉动增长,难道我们的东部沿海地区真的已经完美到了美国欧洲等发达地区的水平了?现在这么多官员赴海外考察,这么多官员的子女在海外就读,我想他们没人会认同这一观点。从产业转移来讲,东部调结构,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移出也是大势所趋,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和20世纪80年代亚洲四小龙的产业升级不同,我们广大的中西部还能承接东部移出的部分产业,所以不会因为东部的调结构损害整体的经济增长速度。从这一点上看,林毅夫乐观观点自有其据,或许这就是大国的优势所在。

(作者系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副教授)

焦点评论

股市长阳迎双节



连跌之后放量涨, A股节前迎长阳。维稳呼声很给力,抄底资金又进场。莫将政策当赌注,要靠市场蓄力量。A股生态须治理,长效机制才健康。

赵乃育/漫画
孙勇/诗

优化产业链才能降低市场风险

闻一言

江苏雅新服装与红豆集团强强联合,实现服装与面料产业互补,着力上下游产业的良性对接,以优势产能应对市场不确定风险,在确保外贸出口的同时,扩大了国内市场的开拓,在市场行情不景气的状态之下,还保持了15%的增长率,使企业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大大提升,稳固住了企业产品在国内外市场上的占有率。

随着国内外市场需求的减缓,传统产业企业生存遭受影响之大出人预料,企业原材料成本、人力成本和管理成本上涨,大大压缩了企业利润率和盈利能力,企业生存与发展能力正经受着严峻的考验。在市场不确定的风险面前,求变是企业突围的一种选择,抱团取暖或能帮助企业克服眼前的困难,然而,加快产业整合恐怕是眼前应对市场风险一种的上乘选项,而优化产业上下游的内联,带给产业链条的生存与发展,则是一种双赢的结果。

世界性金融危机转化而来的经济危机所产生的连带效应,往往会给产业带来相当程度的不确定性因素。从微观上而言,企业因市场骤然变化,让企业仓促应对,由于企业对不确定的市场风险存在着自身抵御能力低下的短板,随着危机加重,企业难免不出现破产、倒闭的问题;而在产业链条上,一些企业因市场变化而出现倒闭的现象,出现因有供应关系不时会因经营者歇业而中断,对上下游企业的生产经营会带来无法回避的难题。在市场环境恶化的趋势之下,随着价格波动的加剧,企业的生产组织及存货准备、原材料库存都变得难以把握与琢磨,市场不确定风险无时无刻不在威胁着企业的生存与发展。

面对风险的厌恶是每一个市场经济主体和所有决策者共有的心理,在市场动荡的时段,管理风险、确定风险和隔离风险比企业的经营决策还要重要千倍。一般而言,企业在经济危机周期内,通常会以“消除威胁”、“降低风险”、“隔离风险”、“完全

避免风险”四种方法,来降低风险性事件发生的概率。江苏雅新服装与红豆集团的强强联合的意义在于:一方面可以保持其产业链上所生产的服装产品的高质量,以实现产品优质优价的市场定位和营销策略,稳定住企业产品的消费群体和培养未来消费群体;另一方面可以降低原材料的存货比例、减少出差成本、感悟布料的流行趋势、随时掌握面料的价格变化,确保企业对原材料的涨价稳定在一个可控的范畴之内;再一方面可消除面料供应商不能及时供应的威胁,降低面料采购上的价格风险,又能隔离上下游之间的震荡传导,确保产业链上下游之间的整合,如同虎统所献的连环计,可让服装企业和面料企业抵御可能出现的大风大浪。

美国学者伊恩·布雷默在其《肥尾理论:不确定世界的政治思维》一书中说,在不确定的世界里,你能做的就是确定你能承受的风险类型。江苏雅新服装与红豆集团强强联合,实际是一种确定风险的过程。应当看到,在全球经济处于衰退周期的关键时刻,面对市场出现的周期性震荡,整个市场边界及主体都在发生结构性的变化。包括原材料、时尚流行、价格、通路、人群销售理念都因危机的发生而出现调节。作为产业链条上的相相关企业必须看到,仅靠个别企业单枪匹马的独闯市场肯定会遭遇到不测,只有联合产业链条的上下游企业协同抗击市场不确定风险,企业度过危机而存活下的可能性才会增大。正是产业链条上的企业看到了“团结力量大”,进而实现了企业之间相互的融合和牵手,确保了产业链条整体效应不因危机的加重加深而危及到整个产业链的生存危机。

由此可见,确保整个产业链条的安全,需要产业链条内的企业紧密相联,协同一致,共渡危机。通过产业链条上企业的强强联合,把市场不确定的风险降到最低点,在抱团取暖之中寻找企业新的增长点。江苏雅新服装与红豆集团强强联合的实例或许会带给我们应有的启迪。

联系我们

本版文章如无特别申明,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也不代表作者供职机构的观点。如果您想发表评论,请打电话给0755-83501640;发电邮至pp118@126.com。

历史形成的养老金缺口应由财政兜底

冯海宁

全国社保基金理事长戴相龙日前在“发展平台经济与促进区域合作”高峰论坛上坦承养老金确有缺口,并建议通过完善养老制度,以达到收支平衡。他表示,个人账户和统筹账户加在一起搞支付,这叫现收现付,这个没有缺口,15年以后都没有缺口。但个人账户在退休时,这些钱都是他的,这时候缺口就非常大了,那时的政府就没法平衡,那是后患无穷的。”

养老金究竟有没有缺口,有两个完全相反的版本。有研究机构报告披露:2013年全国养老金缺口将达到18.3万亿元;社科院社保专家披露,2011年养老金“空账”2.2万亿;然而,人社部则多次表示,养老保险基金收入大于支,当期不存在缺口问题。理由是,目前养老保险的积累资金到今年上半年已经超过2万亿,不仅没有缺口,资金反而还很充裕。

事实上,无论是戴相龙说养老

金有缺口,还是人社部认为养老金没有缺口,说法都没有错,原因在于双方的计算方式不同:前者是计算养老金个人账户得出结论,后者是计算现收现付得出结论。进而言之,前者着眼于长远,后者着眼于当前。坦率地说,在中国加快走向老龄化的情况下,在解决养老问题上绝不能短视,必须要有远见。

今天之所以看起来养老金没有缺口,一是因为目前养老金账户交费的人相对要多,而领取养老金的人相对要少;二是因为有财政补贴,近10年来基本养老保险的财政补贴已经超过了1万亿。但随着社会人口结构的变化,交费的人会越来越少,领费的人越来越多,养老金缺口就会暴露越来越明显。如果财政补贴不能持续增加,养老是未来中国最大问题。

显而易见,现收现付所维持的养老金安全是不能持久的,现在就应未雨绸缪。但是否如戴相龙所说,通过延长退休年龄和养老金

缴纳年限来弥补养老金未来缺口,还值得商榷。因为这些建议的公平性值得讨论,比如,反对延迟退休的多是“私人部门”员工;赞成延迟退休的多是党政部门员工。而且,这些做法能否弥补养老金缺口,社会上也有不同声音。

在笔者看来,解决养老金缺口问题不能只是在普通人身上打主意,首先要清楚养老金缺口从何而来。只有清楚病因才能对症下药。从相关报道来看,养老金个人账户主要是历史原因形成的,即空账问题主要出现在城镇企业职工的养老制度上,这一养老金制度始于1996年。在设计养老金制度时,有的部门坚持现收现付,有的部门坚持采用个人账户,最终形成“社会统筹+个人账户”的养老保险制度。

除了制度,另一个历史原因是,国企改革造成3000多万退休职工无法养老,不得不采取“现收现付制”,用正在工作的人缴纳的养老金来支付现有退休人员退休金,个人账户仅仅记账,由此,形成了养老金个人账户缺

口。也就是说,如果当时充分论证“社会统筹+个人账户”这一制度,并妥善解决3000多万国企退休职工养老问题的话,养老金缺口基本不存在。

因此,历史原因制造的养老金缺口,今后不应让普通人来承担,理应由财政为历史问题买单。而且,目前包括养老保障在内的社会保障支出占我国财政支出12%,远低于西方国家30%-50%的比例,即使是一些中等收入国家比例也在20%以上。这充分说明,虽然过去财政补贴养老金已经超过了1万亿,但相比中等收入国家,我们还是有很大差距。

在笔者看来,历史原因制造的养老金缺口,首先应该制定填补养老金缺口的计划,由财政资金来解决;其次是想方设法让养老金增值,用增值部分填补缺口;第三,养老金缺口是国企改革遗留问题,应由国有资本来解决;最后,改革养老“双轨制”。据悉,企业职工养老金替代率为42.9%,公务员养老金替代率连年保持在100%左右,应该用公务员多拿的养老金来补贴企业职工养老金缺口。

房地产开发贷 定向宽松动力来自何方

周俊生

最近几个月,国家统计局逐月公布的全国房价指数表明,一些城市的房价已经出现了跌幅趋缓甚至有上涨的势头。与此相关的是,近期部分商业银行的房地产开发贷开始呈现“定向宽松”的趋势,针对全国大型房企,特别是全国50强房企,以及“五证齐全”的楼盘项目,银行开发贷支持力度普遍加大。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2年1-8月,房地产开发企业本年到位资金59714亿元,同比增长9.1%,增速比1-7月提高2.9个百分点。其中,国内贷款9886亿元,增长11.2%。这是今年4月以来,国内贷款增速首次恢复到两位数。

对房地产市场收紧信贷口子,严格控制房地产开发贷款,是我国持续已有两年之久的房地产调控中的一项重要政策,为了配合这一政策,资本市场甚至停止了对房企IPO和并购的审批。这种“掐脖子”的效果正在日趋明显地显示出来,房地产开发商的资金普遍告急,使他们无法再像以往那样囤积商品房源吹大楼市泡沫。日前公布的新版胡润中国富豪榜上,房地产开发商群体已经首次从“冠军”降格为“亚军”。为了能够在市场上生存下去,去库存化成为大多数开发商的重中之重,原来坚冰一块的房价也因此而松动。但是,当商业银行开始以“定向宽松”的名义重新向开发商发放开发贷的时候,原来日子难过的开发商无疑获得了喘息的机会,而房价的下行趋势也随之出现放缓甚至小幅反弹。

银行信贷对房地产市场的政策为什么会悄然改变?定向宽松政策的动力来自哪里?这显然与我国宏观经济在今年以来出现的增速下降的局面密切相关。为了实现“稳增长”的目标,各地政府大举推出投资项目,据称最近几个月全国各省汇总起来的总投资额已经远超20万亿元。但是,这些投资大单虽然很诱人,地方政府却面临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便是资金的缺口,因此这些投资大单中有很多项目其实还在政府办公室的抽屉里,没有成为现实。相比于各种投资的费心费力,重启房地产投资,对于地方政府来说无疑是轻车熟路。

今年以来,地方政府不断地试探放松房地产调控政策,虽然一些城市对限购政策的调

整,大都在舆论的追击下流产,但地方政府对于房地产市场这个“龙头产业”的希望并未完全放弃,总在想方设法地从调控的重压之下寻找突围的缝隙。最近,全国土地市场持续升温,房企拿地积极性也明显增加,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在地方政府的主推下,掀起新一轮供地热潮,土地拍卖又出现了一个个的“小高潮”。而商业银行以定向宽松的名义加大房地产开发贷的力度,则是地方政府与金融机构联手策划出的另一个激活房地产市场的动作。

当然,房地产开发贷的增加,仅有地方政府“剃头挑子一头热”是不行的,它还需要商业银行有所作为。实体经济的低迷,使企业对信贷的要求并不像原来想象的那样迫切,银行面临的实际上是信贷萎缩所带来的贷款利息减少的压力,这对主要依赖存贷息差生存的我国商业银行来说是一个不小的问题。而在银行看来,房地产开发贷历来是优质的信贷,只是调控的展开使银行无法继续享用这块“蛋糕”。因此,对于向房地产开发商的信贷,商业银行与地方政府其实有太多的共同语言,双方的共同追求使他们一拍即合。

显而易见,房地产开发贷定向宽松的动力来自地方政府和商业银行的推动。在放松限购政策已经“此路不通”的情况下,地方政府正在从别的角度对房地产调控政策的忍耐度进行试探。只要中央政府对此不作反应,那么,定向宽松终将演变为全面宽松,房地产市场重获生机就有了可能性。地方政府通过市场的复活,又可以获得拉动多个行业的机会,正告紧张的地方财政也可以获得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自然,与这一起来到的,便是房价的全面回升,两年来辛苦经营所获得的房地产调控成果将渐趋暗淡。

将房地产市场作为“龙头产业”,用它的活跃来拉动各行各业,虽然确实保证了前几年国内生产总值的快速上升,但是也给中国经济带来了诸多后患,并且让全社会的民生承受重压。目前我国经济运行出现的困难,在一定程度上正是以前过度倚重房地产市场所带来的后果。地方政府要实现“稳增长”的目标,必须另辟蹊径,寻找新的经济支撑点,如果仍然迷恋于房地产市场这个“龙头产业”,那只能将这种苦果加倍放大,这是一种得不偿失的做法。